

特务谢鲁大骂他：“进了牢房，还在宣传，真是死硬分子。”并将其带出牢房，毒打一顿。

一九四九年三月，罗仲钦也保释出狱了。陈天钰则由成都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和省特委会第三军法组，以侦查十九号定为所谓“奸匪”、“危害国家罪”而结案，从第六号牢房转入重刑牢房，与许寿真、王伯高等革命志士关在一起。

天钰十分敬佩许寿真的渊博学识和革命胆略，两人成了亲密朋友。许在狱中多次与敌人进行斗争，天钰总是积极参加进去。一次，为了争取改善狱中待遇，许和谢鲁发生争吵，大骂特务和他们的最高主子，天钰也呐喊助威。谢鲁恼羞成怒，将他们的双手，从牢房铁窗口拉出来，带上手铐。但他们二人仍骂不绝口。后来许、陈二人分别用世界语和国语同声高唱国际歌，雄壮的歌声在狱中震荡，其他牢房的难友也齐声和唱。这一着吓得敌人惊惶失措，不得不解开他们的手铐，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不幸的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深夜，敌特们在仓惶逃窜前夕，残酷杀害了风华正茂，久经考验的年青共产主义战士陈天钰。他和同时殉难的三十多位勇士，用鲜血浇灌了川西平原的土地，映红了黎明前的朝霞。

“……

在那里，
我们用血来播种，
用生命来播种，
用斗争来播种，
而收获的是一—
我们来日的幸福与自由！”

这是陈天钰烈士生前抄写的一首《播种》诗。诗意充分表达了他高尚的情操与理想。今天，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革命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播下的种子，已绽开出自由幸福的

花朵。

后注：

本文根据四川省档案馆、成都市档案馆有关材料和万县党史办陈天钰撰写的，《陈天钰烈士生平》、温江县志办刘世权撰写的《陈天钰烈士传略》，以及张学培、殷逸民、刘世久、王重民、杨世茂、杨懋、罗仲钦、朱正之等同志的回忆材料整理写成。

（一九八六年三月）

奋发有为的革命青年张大成烈士

张 大 昌

我的胞弟张大成烈士，一九二〇年农历八月八日生于四川省郫县德源乡义林村。我们家庭贫苦，世代以佃耕田地为生。父亲张致祥，民国初年毕业于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堂，他先后在乡村私塾和郫县县立小学教书四十余年，直至解放。母亲税氏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因全家食口八人，生活困难，大哥高小毕业后便在家务农；大成在义林寺初小毕业后，也辍学种田；那时，只有我一个继续上大学，也只能读半公费的工科。大成到十二岁时的体格，已同成年人，十三岁起就学会栽秧、播种，就能使牛踏耙，犁田、耙田、磙田、平田都行，成为家庭中主要劳动力之一。他还自有生活乐趣，最喜欢养鸽子，家里喂的鸡、鸭、狗等都是他管。

大成弟自幼受到家庭的教育影响，养成了秉性正直、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性格。一九三五年夏，温江专署的保安团队到义林寺一带“清乡”，趁机抢掠农家的鸡鸭等财物，还美其名“借用”。在他们的刀枪淫威下，农民敢怒而不敢言。一日，年满十四岁多的大成，遇见这伙恶兵凶徒抢劫了农民财物上路时，当即怒斥他们行为不当。他们恼羞成怒，立即用拳、脚和枪托交替毒打大成，打得他血迹斑斑，遍体鳞伤，筋骨、腰肾都受到折损，疼痛难忍，直到昏倒在地，还骂他“管闲事”方才罢手。经家人将他扶救回家，治疗休养了三年多还不得痊愈，以致不能再承担稍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了，这使他对恶势力更加恨之入骨。

由于大成已基本丧失劳动力，父母兄弟才不得不省吃俭用，积

攒点学费，让他去读书。一九三八年，大成已到十八岁，才去何家场小学读高小。一年后考入郫县初级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全公费的省立成都师范学校。一九四四年大成即以师范肆业生考入四川大学植物病虫害系，第二年转农艺系。因他学习成绩优良，常获公费补助，得以完成大学学业。

一九四三年，曾任四川省团练总局长的地主胡巨川，借口我家过去所缴的租地押金是法币，现在法币贬值了，要将原来每亩六十元的押金提高，加为二百元。我哥哥张文著向他据理力争说，原来缴押金时的法币，是一元值银币一元，为什么还要增加？虽然问得他理屈词穷，但他倚势压人，反而打了我哥两耳光。这个恶霸地主能通官府，有权势，我家暂时对他莫可奈何。但我们的弟兄都有誓报此仇的决心。在外读书的大成闻之，尤为愤怒。

大成在读师范和大学几年中，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一九四三至四五年时，我常由重庆把《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邮寄回家，供大成、大哥和他们联系的群众传阅。在此基础上，我们于一九四五至四六年，在郫县组织有青年三十余人的读书会，积极学习《中共七大文献》和一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撰写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方面的文章著作，从而使大家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和政治形势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大成是读书会的积极分子，进步较快。

特别是大成肄业四川大学时，（一九四四——一九四八年），正值国民党政府对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对内积极反共反人民。他对这些反动行径，愈来愈愤慨，日益更多地投入中共地下党发动领导的革命学生运动，如声援昆明血案，反对中美商约，反对美军暴行，声援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等等。革命群众运动的教育、锻炼和进步同学的启发帮助，使大成的革命思想逐渐树立起来，认识到不打倒蒋政权，中国就没有光明前途可言。他的斗争意志变得很坚决，行动表现非常积极。

当时四川大学有许多进步学术团体，是进步学生交流学术、研讨时事政治和进行民主运动的活动场所。大成参加了自然科学研究社和时事研导社，他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夏，担任了时事研导社社长。“时研社”积极参加地下学联（校内所有进步学术团体的秘密联合组织）发动和领导的学生运动，参加学生自治会竞选，以占领我党在学运方面的领导阵地；组织时事座谈，办墙报刊物，以唤醒群众；揭露批判国民党出卖祖国主权、屠杀人民、施行内战等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凡是开辩论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他都是引人注目的积极分子。

一九四六年夏，大成经张万禄、刘光书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他的二哥（即我）因参加了民盟和民主运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他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同大哥文著几次去向民盟四川省和成都市负责人张志和、张万禄汇报和请示工作，并把我在郫县组织、发展的民盟小组和读书会的活动继续推动发展起来。

一九四七年冬，成都市参议会参议员、民社党党员官箴予和恶霸袍哥头子徐子昌参加竞选所谓国民大会代表。“官大炮”为了多拉选票，在发表竞选演说中，对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了一些指责。四川省政府即以“煽惑群众”、“诋毁官府”的罪名，把他秘密逮捕关进省特委会将军衙门看守所。这虽是狗咬狗的事件，但却戳穿了国民党搞假民主选举的本质。为了使这一选举丑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教育中间群众，中共成都地下组织决定发动一个“保障人权、声援官箴予”的运动。在成都市大专学生举行示威大游行那一天，大成和同学贺新民、贾桂南另行组成突击宣传队，在市内各大影、戏院和华华茶厅等群众集聚之处，发表讲演和散发传单。他们明知这样离开游行大队伍小组活动，目标突出而又势单力薄，最容易为特务所逮捕，但大成等却不顾安危地承担，体现了为革命置生死于度外的英勇气概。

一九四八年三月底四月初，川大十多个学生伙食团联合组成

“伙食团联合会”，推选张大成等十人为代表，前去四川省政府向代理主席邓汉祥（当时，原省主席邓锡侯已去职）请愿，要求配售平价米，未果。回校后，代表团主席刘光书在全校伙食团经理大会上报告请愿经过，并提出拒绝蒋介石将派王陵基继任省政府主席的主张。当场有人反对。大成高喊道：“王灵官是重庆‘三·三一’惨案的罪魁祸首，打倒王灵官！”四月九日下午，在成都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全市大专学校学生五千余人上街游行，冲向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拨发平价米。这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行动，给刚上台三小时的刽子手王陵基当头一棒，打了他一个下马威。“王灵官”竟下令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残酷镇压和扣捕，造成震惊全国的“四·九”血案。大成在此运动中积极组织和宣传鼓动，勇敢地参加了示威游行。

大成对革命同志非常关心。一九四八年秋，他从川大毕业回到郫县家里后，得知特务在川大抓人，估计有的同志在成都处境危险，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赶来成都，把民协、民盟的陈光明、蒋国基二人接到自己家里住下，躲过那段时间。

原郫县民盟组织负责人之一刘仁清，一九四六年逃脱敌人追捕，通过原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到国民党军第三六五师任营长；一九四八年八月，刘任绵竹团营区第一大队大队长，暗中准备起义。同年秋，刘过成都，大成专门与他晤谈，迫切要求随刘去当兵，以便学点军事工作本领，并协助刘搞策动起义工作。刘以大成性情太爽直，不易掩护，不适宜做秘密工作，易暴露败事而婉言谢绝了。几日后，经蒋国基的姐姐介绍，大成和川大同学董绛云、张才裕、周抚养、邱蔚云、袁泽民等民盟与民协的同志去简阳县立女子中学教书，意欲在那里开辟一个革命基地，但因该校人事关系复杂，未能如愿。

一九四九年初，大成经地下党员马锡禄、马肃庭介绍，得识中共雅乐工委派到灌县的负责人李维实。经了解后，李维实偕马锡禄、马肃庭于同年三月一日去郫县德源乡张家，由二马介绍吸

收张大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日或第三日，并由李维实同志主持了入党宣誓。接着，李维实同志同意他利用其未婚妻董绛云之父董介蕃在灌县女中任教务主任的关系，偕同董绛云（不久即与董结了婚）去灌县男、女中教书。并指示他在灌县中学设立党的联络点，接送来往于成灌线上的地下工作者。他还团结发动灌城中学的教师，创办了英语刊物和油刊小报（两期），报导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鼓励师生积极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并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种种倒行逆施。

稍后他还协助李维实同志到我们郫县家乡一带，在民盟成员中吸收一些够条件的人入党，大哥张文著也被接收入党了。在李维实的具体领导下，他们在郫县的德源、青龙、迴龙三个乡积极筹建地下武装，发展了有六百人枪，在温江的隆兴和涌泉两个乡，还发展了约八百人枪。一九四九年冬，中共川西边临工委组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时，成立了以李维实为首的“岷江支队”，统率温江、郫县、崇宁、灌县的地下武装。大哥张文著是其中郫县区队和德源乡大队的负责人。后来，在安定社会秩序，迎接解放，协助解放军平定土匪暴乱、征粮及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中，这支群众武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闰七月，中共雅乐工委派了仁寿县的地下党员祝良安和农民骨干分子廖维正去灌县象峨煤矿工作。他们路过灌县时，去县女中会马锡禄，马不在，由大成接待。祝、廖到矿后，以拜把兄弟的方式结识了许多工人。农历八月初，二人请一驻矿士兵喝酒，借聊天启发该士兵认识共产党的好处和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酒后，该士兵在寝室大声说：“国民党要完蛋了，共产党要来了，我要参加共产党”等。矿警主任得知后，当即电告国民党温江专区保安司令部将该士兵抓去审讯，供出廖、祝二人。廖、祝被捕，又供出了大成和马锡禄等（二人在赴灌途中，曾在双流擦耳乡的中共地下联络站住宿，在该站工作的地下党员徐海东及该站掩护人徐茂森，也因廖、祝叛变而遭逮捕），地下党组织决定

立即撤离有关人员。但大成认为，他与廖、祝既无组织关系，又未谈及党内组织问题，即使他们供出与他接触的情况，也无多大关系，故未撤离。恰在这时，温江专署专员冯均逸密电灌县县长程文蔚说、崇宁县丰乐场、桂花场民主联军的起义有马锡禄、张大成等人策动，令立即逮捕。由于内部原因，灌县当局没有立即行动。第四天（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即十月十八日），温江专区特委会秘书王人杰亲率特务来灌县，于中午逮捕了大成，但当即为其岳父董介蕃（国民党灌县参议会参议员）所保释。形式上是释放了，但却为特务盯住不放。大成对此异常冷静，他想，特务并未抓住证据，如果一走，反而会暴露，将对组织造成更大损失。于是当天他仍镇定自若，下午和晚上继续在校上课。傍晚，马肃廷趁暮色去寝室看他，不在，马留了一张暗示他从速转移的条子。这时，温江专区特委会秘书王人杰和灌县特委会秘书肖襄又找到男中校长彭玉元去学生自习室骗出了正在上辅导课的大成，马上把他押走了。

大成被捕后，关在灌县自卫总队。他在敌特审讯中，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党的组织。他的爱人去看他时，他悄悄问道：“小马（马锡禄）没出事吗？”当她说都很安全时，他露出胜利的微笑。在如此危难的环境中，大成仍然顾念其他同志的安危！

大成随即被敌特从灌县押去温江，半月后转送到成都四川省特委会将军衙门看守所监禁。在狱中他迭遭严刑拷打：先是把他的双手反缚吊在梁上；继后又把他的双手和双脚的拇指缚着，腹部向下，反吊起来，四个拇指都吊断了，鲜血淋漓，昏死过去。当他复甦以后，还是毫不屈服，英雄斗争，没有吐露半点资敌的材料，保护了党和民盟的组织与同志。

凶残成性的国民党特务在覆灭前夕，竟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深夜，将一批坚贞不屈的狱中革命志士，绑押到通惠门外十二桥集体屠杀了。成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发掘出这些烈士遗体，原郫县地下武装成员肖乐贤（我们的二姐夫）、张书林

(我们的堂弟) 到现场去识别时，发现大成遗体缺少了右腿，口鼻还在流血。可以看出，烈士殉难时，还和刽子手们作过激烈的搏斗。他对革命一贯的英勇行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母亲对于家庭有为革命如此壮烈牺牲的好儿子感到无限光荣，但因其遗体不完整，二老直到一九五九、六〇年相继去世时，仍在心中深刻思念。大成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为革命而奋斗的热忱，对党和人民事业忠贞不贰的品质以及对敌人顽强斗争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代学习的。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改撰)

“川西解放组”五烈士

杜可、龙世正、彭代悌、刘仲宣、云龙

郑 畅

一九四八年冬，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场上崩瓦解，全军覆没，地处国统区后院的成都，也未能让国民党反动派高枕无忧，乐享太平。这年十二月二日清晨，在春熙路、鼓楼街一带贴满了署名为“川西解放组”的革命标语，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统治；要求解放军早日来川驱逐反动派。这些不断出现在成都街头的标语传单，使盘踞在蓉城的军警宪特机关张惶失措，倾巢出动，结果一无所获。

延至一九四九年初夏，连日阴雨。省会警察局宝光寺分驻所的警士在收拾被漏雨淋湿的床草时，发现一大叠“川西解放组”的传单。分驻所所长李藩立即签报一分局局长杨纯，杨下令将住该寝室的警士李国扬传局责问。李国扬说出有个渠县人彭代悌，原是宁夏街监狱的看守，被开销后，到这里来住过。杨纯即令李国扬监视彭代悌，收集证据，扩大线索。

与此同时，有个出狱的抢劫犯名肖释因，在街头碰到旧相识左世银，相约至少城公园鹤鸣茶社喝茶。肖对左说，我在宁夏街监狱发现了共产党组织，他们利用监狱的印刷设备悄悄印传单，署名是“川西解放组”。左说他的姑父刘鉴先是军统蓉站副站长，把这个情报打到蓉站去，一定可以当官发财。

于是，左世银把肖释因引去见刘鉴先，肖说，在监狱里领头